

重建巴別塔，如何可能？ ——評介彼得柏克、夏柏嘉編 《歐洲近代早期的文化轉譯》

韓承樺*

書名：*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作者：Peter Burke & R. Po-Chia Hsia eds.

出版時地：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頁數：ix + 252pp.

那時全地的人只有一種語言，都說同樣的話語。

——〈創世紀〉第11章第1節

起初神創造天地，人類說著相同的語言。神用大洪水審判全地以後，人在地上形成邦國，並企圖建造一座宣揚自己的城和塔，免得被分散在各地，這座塔名叫「巴別」。耶和華知道人類的意圖，於是變亂了全人類的語言，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並分散在各地。¹這是記載於《舊約聖經》的一則故事，也是翻譯學界時常引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¹ 台灣福音書房譯，〈創世紀第11章1-9節〉，《舊約聖經恢復本》（台北：財團法人台灣福音書房，2005），頁48。

用的材料，它象徵了人類語言多樣化、複雜化的特性。而試圖重建「巴別塔」，使得不同民族能夠重新搭建起一座「譯介的橋樑」，並在各方面互譯互融，也成為我們在現實世界不斷努力的目標。

傳統翻譯學研究僅環繞著翻譯技術、語言學等議題作討論，而陷入了純語言文字面的翻譯研究。在 90 年代由 Andre' Lefevere 編著的《翻譯，歷史與文化論集－資料彙編》顯示了翻譯學有更開闊研究內涵的可能性，包括：權力和贊助商、意識形態、文本型態等因素需要深入探索。²這一番「文化轉向」的過程，它突出了翻譯活動在文化層面上的課題。另一方面，許多研究者開始質疑不同語言之間的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是否存在，若各式語言間並不存在等值關係，那麼我們該如何評估在「巴別塔」崩毀之後的語言世界，而當一份文本將被介紹至不同語言、文化之地時，「翻譯」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綜合兩方面的趨勢，翻譯學本身不僅獲得更寬廣的開展性，也成為文化研究、歷史研究的一項新利器。³

Peter Burke，著名的英國文化史家，在文化史、史學理論、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等領域皆為著作等身的學者；⁴R. Po-Chia Hsia

² Andre' Lefevere. eds., 《翻譯，歷史與文化論集－資料彙編》（*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近年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許多國外翻譯學的專論作品，此套叢書名為《國外翻譯研究叢書》。其中不乏討論翻譯的文化史，以及「文化轉向」後的翻譯學研究，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³ 近年來出現不少以翻譯為切入角度的歷史著作，由於筆者關注的焦點限於中國近現代史，便只列舉一些相關專著僅供參考：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Lydia H. Liu edited, *To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2004. 第一本書的中譯本是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另還有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1998）。

⁴ 台灣學界目前共譯有彼得柏克的六本著作，讀者對他應是十分熟悉，相關介紹可參見，楊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的興起－與劍橋大學彼得柏克教授座談側記〉，《史學理論研究》，1期（2000），頁138-159；陳建守，〈文化史的由來、實踐及意義－介紹兩本討論文化史的著作〉，《思與言》，44卷2期（2006.06），頁243-267。

（夏伯嘉）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職於賓州州立大學講座教授，其專長為 15 至 18 世紀歐洲史。兩人編寫的《文化轉譯》，是一本探討翻譯的文化史的論文集。整體而言，這些作者的研究焦點為：當翻譯活動流行於歐洲近代早期，對歐洲國家、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1970 年代晚期的翻譯研究運動的目標在於給予翻譯在學院內更中心的位置（頁 2），強調譯者對譯本的實際作為（what translators actually do），讀者的接收（reception）等層面（頁 2）。本書則向讀者示範了在「文化的轉向」、「歷史的轉向」後，一些翻譯研究和歷史學之間對話的可能性。書名《文化轉譯》（cultural translation），透露本書在研究方法上的兩層涵義：第一是將翻譯活動置於近代早期歐洲文化交流史的脈絡下，描寫它在文化史中的角色；第二是評析語言翻譯背後文化內涵的轉介、互動過程。全書共有 12 篇論文，分為三個主題：翻譯和語言、翻譯和文化、翻譯和科學，環繞著「文化史中的翻譯活動」與「翻譯的文化史」兩個課題，交織出三個目標：1. 填補過去翻譯領域中較忽略的文化差異、長時段、實踐等問題；2. 鼓勵翻譯研究和文化史工作者展開對話，他們交集在探討語言與文化轉譯之間，文本與觀念的傳遞問題；3. 補足以往研究在文本選擇上的遺漏，過去多重視文學作品的翻譯，本書則著重資訊和知識的翻譯問題（頁 3）。

一、翻譯和語言

第一個主題關注的問題在：不同語言文本的翻譯在歐洲近代早期的概況。⁵首先，Peter Burke 以一篇概論性的文章為全書揭開序

兩年前柏克受邀至台灣論學，筆者有幸曾在政治大學親炙柏克對文化史的見解與省思，如今有機會介紹柏克的新書，不禁回想起柏克的翩翩風度和幽默風趣的談話。對此，筆者藉此文對這位文化史大家致上深深敬意。

⁵ 本主題的文章包括：Peter Burke, “Cultures of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R. Po-Chia Hsia, “The Catholic mission and translation in China, 1583-1700;” Eva Kowalská, “Language as a means of transfer of cultural values;” Peter Burke, “Translation into Lati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由於本書收錄文章的作者皆為歐洲史家，其中大多為台灣讀者較不熟悉的學人，在此，筆者藉由本書的簡介對他們稍作介紹。Eva Kowalská 任職於斯洛伐克科學學院（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研究領域為前現代匈牙利的宗教和文化史。

幕，文章描寫歐洲近代早期的翻譯概況，並討論語言在不同文化的翻譯脈絡的問題（頁 7）。細究 Burke 所謂的「翻譯文化」（cultures of translation），可分為：譯者、意圖、翻譯了什麼、接受者、策略、結果等六項，彼此相互交錯影響（頁 11）。此框架同樣可見於本書的其他文章。作者認為，即使譯者試圖保持中立，但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如此（頁 38）。由不同語言書寫的文本，在翻譯過程中都必然涉及了「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的雙重過程，而對異文化中的觀念、價值便產生某種程度的誤解和遺失。夏伯嘉的文章以在中國的傳教士為中心，討論自 16 世紀到 18 世紀翻譯活動在中歐文化交流中的角色。本文延續前文「翻譯文化」的架構，從文本、譯者、譯介過程與接受幾個層面來描寫這波翻譯風潮下的實際成果、影響。作者以傳教士與中國知識分子為中心，評估雙方的合作互動，西方宗教、科學、人文知識藉由多種語言文本的來往交鋒，歐洲和中國的書籍市場與知識世界確實興起一陣濃濃的異國風。Eva Kowalská 是從斯洛伐克語的角度來觀察捷克語的新教聖經（頁 3）。斯洛伐克因為使用捷克語來傳播新教聖經，使得捷克語漸漸成為斯洛伐克人和宗教儀式之間的聯繫工具，但也成為區分兩個種族團體（ethnic group）的因素。這種接受外國語的案例，從她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語言提供斯洛伐克和捷克之間一種直接關係的觀念，使雙方得以擁有一種共同意識（頁 54）。在這裡，語言不只能區分文化差異，也能成為日後捷克斯洛伐克統合的基礎。Peter Burke 另一篇文章描寫較被忽略的翻譯課題：從方言翻譯回拉丁文（from the vernacular into Latin）。這些譯作主題包含宗教、歷史、自然哲學、地理、小說、政治等主題。作者認為，這些為數不少的拉丁文翻譯本的存在證明當時拉丁文形式的知識仍十分普遍，而且許多邊遠地區受教育的人民認為方言較困難，無法閱讀（頁 65）。文末指出，歐洲近代早期在面對文化轉譯時的兩難：「馴化」（domestication）和「異質化」（foreignizing），如同這篇文章所發掘的，或許「古典化」（classicizing）這種將方言翻譯回拉丁文本的作法，可視為第三種可能的解決之道。

總的來說，這四篇文章都觸及譯介異文化的科學、宗教、藝術、歷史典籍時，因語言差異所造成文化轉譯時的不確定性，而從此一不甚穩定的狀態到現今堪稱穩固的詞彙和觀念，是經過多次的妥協和適應的結果。⁶另一方面，這些研究者揭櫫了語言成為文化交流的工具時，它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自由流動，它總是受到文化包袱（cultural baggage）的阻礙（頁 80）。

二、翻譯和文化

第二個主題則將重點擺在翻譯活動對文化交流的實際影響，四篇文章分別為天主教觀念、政治理論、歷史著作、期刊的個案研究，論述「文化轉譯」在其中的問題。⁷Carlos M. N. Eire 描繪透過天主教典籍（devotional text）的翻譯，其中的觀念（Catholic piety）在近代早期歐洲的北部、西班牙、法國的傳播情況。此文雖偏重於描寫層面，但作者在文末則進一步指出僅是建構文本的系譜學是不夠的，文化翻譯涉及層面廣，包括譯者、出版商、印刷者、分銷者和旅行者等環節皆應考慮（頁 98）。而諸如比較研究、翻譯者的個人研究、多層面的分析（如語言學、認識論、神學、社會面）、目錄

⁶ Burke 的文章均提及新詞彙的問題，Hsia 的研究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在創造新詞彙來承載天主教觀念的問題，Kowalská 則論述捷克語和基督新教儀式、教義之間的聯繫。詞彙和觀念之間的關係十分值得注意，新詞彙的問題是翻譯研究中不可忽視的環節之一，在異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只要有兩種以上語言的翻譯，必然涉及了新詞彙的創造與競爭，以中國的狀況為例，隋唐時期為譯介佛經而創造出許多音譯詞、意譯詞，音譯大多無特殊意義，而意譯如「業」的概念便沿用至今。而清末民初則為另一新詞彙顯著萌發的階段，大致可看作中譯詞語（這方面又以嚴復為主）與日譯詞語的一場競賽。最後的結果大多是日譯詞彙流傳下來。相關研究可參見周光慶，劉瑋著，《漢語與中國新文化啟蒙》（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周一農，《詞彙的文化蘊涵》（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⁷ 本主題的文章包括：Carlos M. N. Eire, “Early modern Catholic piety in translation;” Geoffrey P. Baldwi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eter Burke, “Translation histories;” Maria Lúcia Pallares-Burke, “The *Spectator*, or the metamorphoses of the periodical: a study in cultural translation”. 三位作者：Carlos M. N. Eire 是耶魯大學歷史與宗教研究的教授，其研究專注於中古晚期到近代早期歐洲的社會、思想、宗教和文化史。Geoffrey P. Baldwin 的研究範疇在近代早期的思想與政治思想史。Maria Lucia Pallares-Burke 任教於劍橋大學的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其專長為文化史研究。

學式研究都需要逐漸開拓（頁 99-100）。Geoffery P. Baldwin 運用翻譯研究，試圖填補過去政治觀念史、文化史研究無法解決的跨文化課題，作者認為近代早期的歐洲各式政治理論跨越國界時，翻譯的文本為了進入新的文化背景，勢必得適度調整其理論內容。發達的翻譯事業使得不同的政治觀念如：法律和憲法、專制和共和、政府原理等穿梭在歐洲大陸，而理論在旅行的同時，它們也不斷地變換自己的面貌與內涵，以適應新的社會結構。Peter Burke 另一篇文章則討論被譯介的歷史著作，他以 Francesco Guicciardini 的 *History of Italy* 和 Paolo Sarpi 的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兩本書為個案。考察近代早期歐洲不同文化背景的史學譯作，其傳播概況與讀者的接受程度。文章前半部，為地圖式地描繪當時歐洲各國史學著作的翻譯情形，分別以作者、語言、內容為統計項目。後半部則為個案研究，對兩位史學家著作的翻譯本作細部的討論，比較各種語言的版本之間的差異，藉此梳理出各國的文化背景對這些被轉譯的史學論著造成的影響。最後一篇期刊研究的文章，Maria Lúcia Pallares-Burke 以一份英文期刊 *Spectator*（1711-14）為研究對象，考察它的生產過程，是如何模仿、翻譯先前發行期刊的模式；描繪當它被轉譯至各國境內時，所引起的各種文化爭議。此文回應了文本翻譯中關於「達」（intelligibility）與「信」（fidelity）⁸的兩難，透過 *Spectator* 的形式在歐洲國家被模仿、改造、修正等事實，作者認為這是一種「創造性的不精確」（creative infidelity）（頁 150），這種為使文本適應異文化脈絡的作法，即為本書主旨—文化轉譯的一種形式。

四位作者藉著個案研究的方式，為讀者展示了文化轉譯的實際案例，這些事例皆指出，當一份文本被翻譯時，它是先離開了原有文化脈絡，而進入新的文化脈絡。這現象告訴了我們：哪種文本與觀念能跨越文化疆界，以及哪些是歐洲近代早期的民眾能在不同文化中同樣感到有價值的（頁 103）。除了文化的能動性以外，上述

⁸ 「達」與「信」是筆者借用嚴復為翻譯立下三項標準（信、達、雅）的概念來翻譯 intelligibility、fidelity 兩組詞彙。

四篇文章也證明了文化雖能透過文本轉譯「旅行」至各地，但它仍身處於社會之內，受到社會結構的制約。

三、翻譯和科學

第三個主題集中討論科學知識在近代早期歐洲的翻譯概況，文章環繞著歐洲大陸和希臘、土耳其、俄國之間的翻譯問題。⁹Isabelle Pantin 考察從 16 世紀到 17 世紀，翻譯在科學文本傳播過程裡扮演的角色為何。文中有幾個重點，方言和拉丁文版本之間的翻譯、兩者的比較研究、翻譯過程中的主要因素：商業利益和意識型態動機。作者比較了方言和拉丁文的科學文本後指出，方言之間的翻譯文本的數量少於從方言翻譯為拉丁文的文本，隨著語言的轉譯，文本的內容也隨之更改，拉丁文翻譯趨向加長文本，方言文本則趨向縮短（頁 168）。在兩種語言文本的競爭中，雖然拉丁文保持著較高貴的地位，但將科學文本翻譯為方言卻能將之通俗化，同時也使各地方言逐漸提升自己成為能代表其文化的語言。在影響翻譯的主要因素方面，Pantin 認為意識形態動機較為多變，商業利益較為一致，如譯者、閱聽人、書籍市場，兩種因素是交織在一起的。

Efthymios Nicolaïdis 研究 15 至 18 世紀科學知識在希臘和歐洲之間交換的問題，本文跨越兩個時段：拜占庭帝國最後十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15 世紀拜占庭帝國為抵禦土耳其人的武力，展開向西方求援的活動，而伴隨文化交流的翻譯事業就此展開。同時接受西方國家和東方波斯的科學知識，以天文學為主體的文本透過翻譯傳入拜占庭，希臘語是讓東方和西方科學知識交換的語言工具，

⁹ 本主題的文章包括：Isabelle Pantin, “The role of translations in Europe scientific exchange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Efthymios Nicolaïdis, “Scientific exchanges between Hellenism and Europe: translations into Greek, 1400-1700;” Feza Günergun, “Ottoman encounters with Europe scienc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translations into Turkish;” S. S. Demidov, “Translations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 in Russia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四位作者：Isabelle Pantin 任職於巴黎第十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 X-Nanterre），專授文藝復興文學。Efthymios Nicolaïdis 的研究領域專注於拜占庭和現代希臘時期的科學史。Feza Günergun 是伊斯坦堡大學的科學史教授，其關注的議題在土耳其現代化時期的科學史研究。S. S. Demidov 這位俄國史家，專門從事數學史、科學史的研究工作。

拜占庭帝國則仍然是文化交會之地。而透過拜占庭的譯本，科學知識得以自波斯傳播至歐洲（頁 191）。鄂圖曼統治時期，因為崇拜希臘過往的榮耀而追尋古希臘科學，其翻譯作品不僅傳佈了古希臘科學知識，也讓希臘社群在 18 世紀時得以融入歐洲文化。

Feza Günergun 處理近代早期的鄂圖曼帝國和歐洲科學文化相遇的課題，16 至 17 世紀之間，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鄂圖曼的知識版圖裡相互競爭。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文本多半屬於醫學領域，西方文化則提供大量的製圖學、地理學、天文學、醫學知識。伊斯蘭科學文化掌控至 18 世紀末漸微，西歐科學和技術知識則透過翻譯與其他方法從 16 世紀起滲入鄂圖曼帝國（頁 192）。最後，西歐科學文化取代阿拉伯文化成為鄂圖曼帝國邁向西方現代化之路的模式。S. S. Demidov 研究 15 到 17 世紀時科學翻譯在俄國的問題，呈現出這段時間流通於俄國翻譯本的來源從拜占庭轉變為以西歐文明為主的趨勢。此轉折點發生在 16 世紀初期，俄國隨著對向現代化的渴求日增，對西方科學、文化的興趣也逐漸提升，來自西方的翻譯書籍包括占星學、幾何學、地理學等科學知識進入俄國社會，伴隨國家、社會結構的改革，可謂俄國現代化的雙重變奏曲。從這四篇文章來看，作者環繞著科學知識的翻譯、交流，國與國的接觸、國家內部變化，這幾個主題是交織在一起的，而翻譯活動便扮演了其中穿針引線的關鍵角色。

本書集結了許多不同領域諸如宗教史、科學史、文化史、文藝復興史、社會史等專長的學者，雖然是論文集，但從書中我們依舊可看到一條貫串論文集的基本提問：在不同文化網絡和社會結構之下，各式語言代表的文化世界靠著翻譯活動如何相互交流？互動的影響是什麼？這是本書每篇論文不斷想要回答的問題。在書寫策略上，作者們就其專長在這條軸線上盡情發揮，雖然研究對象並不一致，卻始終扣緊文化、社會、語言、翻譯四個要素。根據他們的結論，筆者認為本書對上述問題所提出的解答是這樣：就 Burke 開宗明義所提出「翻譯文化」的架構而言，六項要素皆屬於社會結構的環節之一，也就是說，翻譯雖然握有文化轉譯的主導權，但在這段

文化交流的歷史中，一方面看到文化能動性的發揮，另一方面看到社會結構的功能與制約。文化轉譯便在兩者的交織互動下發生。文本旅行過程中，對文本的改造、增補都是為讓它適應新文化網絡的作法。本書提醒了我們，關於這段翻譯的文化史，不能單純地將之歸因於文化因素，社會結構也須納入考慮。

除了上述的中心議題，本書還有以下特點：一，語言跨度廣，全書 10 位作者涵蓋了 9 種語言（頁 3），因此能處理橫跨多國語言之間的文化轉譯課題，為讀者描繪出一面多元語境的翻譯地圖。二，跨領域合作，本論文集所觸及的議題範圍廣泛，作者各有所長，呈現在讀者眼前的不僅是一張翻譯文化史的地圖，更是近代早期歐洲的知識、文化、科學網絡。三，時間跨度長，這也是本書寫作目標之一，利用長時段的特性，標誌出文化轉譯的大趨勢。四，成功地整合了文化史和社會史，讓讀者了解文化轉譯是受到文化與社會結構兩者交互影響下形成的。五，成功地讓翻譯學與歷史學展開對話，透過本書，讀者可發現兩個領域在某些議題上是有交會、可辯論的。

本書雖替翻譯學、歷史學研究開展了一個新方向，但筆者在閱讀之餘對其中若干問題感到仍待進一步商榷，此外，也有一些值得再延伸之課題，在此一併提出就教於諸位方家：

其一，是翻譯（translation）還是譯述（paraphrase）？讀者可在書中看到這兩個詞彙交替出現，但評者以為兩詞彙的意義大不相同。譯述是夾譯夾述，如近代中國的著名譯者—嚴復的譯法便屬於此類。¹⁰這樣一來，翻譯不僅是客觀的譯介，更參雜了譯者的意識，這些不能混為一談。但本書並未仔細推敲此問題，實為可惜。

其二，由於本書處理課題的時間範圍長，因此多半環繞著譯本外部作量化統計，從數量變化來考究這段歷史，並未從文本內部「質變」的角度出發，深入挖掘譯本之間的演變，及演變的歷史意義何

¹⁰ 關於嚴復翻譯的問題，可參考：黃克武，〈嚴復的翻譯：近百年來中西學者的評論〉，收入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編，《嚴復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8），頁605-616；沈蘇儒，《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頁55-99。

在。

其三，多學科的合作。這並不只是結合不同領域的史學研究者，而是需要諸如：語言學、宗教學、文學等學門的投入。不單在翻譯文本上進行文化史、翻譯學式研究，而是多層面分析，譯者的意識形態、贊助商、出版機制、書籍史¹¹等角度都得整合思考，方能較完整地串連起文化、社會、文本、語言。

其四，語言對等關係是否存在？這也是本書欠缺關注的課題，若我們以語言角度進行跨文化研究，那麼便不能忽略語言之間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的問題。當前研究趨勢往往在語言之間的等質關係打上問號，質疑語言是否能如實轉換兩種概念。本書並未考慮此面向，這卻是需要研究者細細思索的。

其五，缺少比較研究。筆者認為如要深入考察原文文本和譯文本，必須對兩份文本進行比較研究。然而，為何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這樣作呢？如本書所論，經過轉譯而輸入的文化，必然經過改造、修正、增補等程序以適應新的文化脈絡。那麼這些轉譯後的文本便不只有譯者的客觀翻譯，更加入主觀的詮釋與批判，在「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¹²的過程中，什麼被譯者選擇？什麼被放棄了？詞彙能否精確表達其觀念？譯者這些主觀作為都是交織在一起的，而呈現在讀者眼前，究竟是一份「新文本」，或是所謂的「翻譯本」呢？藉由逐字逐句的考察原文本和譯本之間的差距，也許能更全面地掌握「文化轉譯」的歷史問題。

雖然筆者提出了上述意見，卻不足以減損本書的學術價值，它不僅為讀者拼湊出近代早期歐洲的翻譯地圖，也提供了許多方法論的啟發。而翻譯學與文化史研究的這場對話，提醒長久以來習慣歷

¹¹ 關於書籍文化可參考：Leslie Howsam, *Old Books And New Histories: An Orientation to Studies in Book And Print Culture*,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2.

¹²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

史學訓練的我們，注意到語言的歧異性。或許，本書所勾勒的議題和方法論，能使更多的歷史問題浮現於眾聲喧嘩的語言世界。